



RIBEN  
SHEHUI



---

日本  
社会

---

社会学丛书

〔日〕中根千枝 著  
许真 宋峻岭 译

24959

C91

3

社会学丛书  
日本社会

〔日〕 中根千枝 著

许真 宋峻岭 译



S0143395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明 限 表

中 日

1975年

Japanese Society

Chie Nakane

First Published by Weideld  
& Nicolson 1970

Revised editio. published  
in pelican Books 1973

本书根据英国企鹅图书公司  
1973年修订版译出

## 日 本 社 会

〔日〕 中根千枝 著  
许 真 宋峻岭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 3/4 插页3 字数190,000

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7,300

统一书号：3072·560

定 价：0.55元



S0143395



费孝通教授和中根千枝教授

Professor Fei Hsiao-Tung,  
With admiration  
and best regards,

Chie Nakane

Peking, April 4  
1975.

费孝通教授，

怀着钦佩和最好的祝愿。

中根千枝

1975年4月4日于北京

## 出版说明

社会学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门学科的研究曾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二十多年。目前，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为了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正在努力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关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这门学科也日益发生兴趣。为了积极配合我国社会学的研究、重建、普及和提高，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社会学丛书，以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

这套丛书除新的社会学著作外，还包括一部分旧著和外文著作的译本。我们将其中旧著标明为“旧著重刊”，注明原出版单位和时间，除个别属于技术性的错误外，一般不作修改，以便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研究情况和它对认识中国及中国革命发生积极作用的历史痕迹，包括它本身的缺点。热切希望社会学工作者和读者给予积极的建议、批评和帮助。

## 译者前言

这个译本所依据的英文原著《Japanese Society》（《日本社会》），是作者中根千枝教授（女）一九七五年四月访问我国时奉赠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费老得书后连夜阅读，次日即对之作了好评，使作者受到很大鼓舞。

中根千枝博士是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现任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教授，该校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她一九二六年生于东京，从小学到中学是在北京度过的，一九五〇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系藏史专业，后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

《日本社会》是中根教授直接用英文撰写的，一九七〇、一九七三年两次在英国出版。该书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细致地分析了从政党、团体、企业一直到村落、家庭等日本社会的独特的组织结构，各种集团的内部、外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的积极性的发挥所产生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这本书不但对研究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对研究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对研究日本工农业企业的管理问题，以便在我们的管理工作中借鉴其长处，避免其短处，也会是有裨益的。

中根千枝教授的其他主要著作有：《日本农村的血缘关系

与经济组织》、《母系制度的比较研究》、《西藏农民的实际情况》、《锡金的多民族社会》等。中根千枝以“纵式社会”论闻名于社会人类学界。她一九六七年发表的《纵式社会中人们的关系》一书，被认为是一面借以对日本社会结构进行重新认识的镜子，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这个译本之得以问世，首先有赖于费孝通教授的关心和指导。作者中根千枝教授本人盛情为中译本写了序，费老亲自逐译成中文。于土、乃光、蔡铭熹、钱兆和、方隽等同志也曾在翻译过程中给了宝贵的帮助。谨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一九八一年六月

## 中译本序\*

当得悉我所写的《日本社会》一书的中译本将在中国出版，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经常想到中国的体系一定和日本的体系有所区别，我很愿知道中国的社会是怎样活动的。因此，我真正地想知道中国读者在阅读了我对日本社会的分析之后对他们自己的社会会有什么看法。

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与对人们相处有明确的礼教和原则的中国传统不同，日本有关人们相处的原则是不容易知道的。从礼教来说，日本引借了中国的伦理，但是在日本人从中国人那里吸收的东西同日本人思想和行为的样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例如，据日本人说，子女对父母应尽孝道是出于抚养之恩，并非只是因为他们是父母。

在本书中，我集中分析日本人民实在的行为，不管他们有什么伦理上的说法。这样做的结果，读者在本书中见到了一种和中国很不相同的体系。它的结构是相当简单。我相信中国体系一定复杂得多：在我看来中国体系似乎在私人关系方面允许更大的机动。例如，取得领导权的过程和日本体系是颇为不同的。我觉得中国人重贤能而轻阶序，而日本人则相反。

人与人关系和团体结构的原理较为简单，也许有利于日本工业化的迅速和成就。也应当记住，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相比较，在人口和地域上都是小得多。总之它是一个纯一的社会。

全体人口的统一性同我在本书中所叙述的体系一定是密切相关的。

我没有特别提到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要建立友谊，我们必须相互了解对方人与人关系及团体结构的模式。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着文化及历史的密切关系，双方易于忽视两者之间基本上的社会区别。如果我这个小书能对两国间相互了解有所贡献，我将感到极大的喜悦。

中根千枝

1981年6月18日于东京

\*作者特为中译本写的这篇英文序言，是费孝通教授亲自译成中文的。

## 原 序

这本小著概述了当代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试图予日本社会以新的阐释。在探讨我国社会的时候，我所使用的仍然是我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者所熟悉的方法。在研究其他民族社会时也然。但本书没有采用科学论文的形式（这从本书没有书名提要即可看出，同时我也尽量不引用实地调查中得来的繁冗的数字资料）。

本书综合了日本人民生活的主要特征，力求廓清日本社会的结构形象。考据取材于当今日本的各种集团——工业企业、政府组织、教育机构、知识界、宗教界、政党、村落、个人家庭等等。在如此宽广的研究范围内，我始终把注意力集注在个人行为和人人与人的关系上，因为这两者是集团组织的基础，也是决定一个集团发展趋势的结构特性的基础。

有些人可能感到本书中的某些论断言过其实，或推论太广。这些批评家可能根据自己偶然看到的情况提出反对意见。还有些人可能反对说，我的例证缺乏准确详尽的资料作依据。这本书当然并不包罗日本社会生活现象的全部领域，也不自诩对某个特别社会集团作了精细的研究。本书并不是在描写日本社会，或日本文化，或日本人民，也不是在解释日本的城市化、现代化一类的局部现象。不，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是为读者提供一把钥匙（一种知识与洞察力的泉源），以帮助人们理解日本社

会，理解那些为它所独具的，使之区别于其他复杂社会的特征。我象艺术家调配色彩那样，用各色各样的、富于启发性的证据为材料，来阐明日本人生活中最攸关的方面，以便人们更容易理解日本社会的结构核心。我自己是善于调配这些色彩的，因为我就是生长在这种色彩的环境中的。我熟悉不同色调的不同效果。在调配我的色彩时，我没有使用任何现成的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凡是能够有效地表达主旨的材料，我都可采用。社会人类学家可能比一般人类学家更喜欢采用这种方法。

本书的理论基础，最初是在我的早期著作《日本农村的血缘关系与经济组织》(Athlone Press, London, 1967)一书中提出的，它来源于我在日本农村的实地调查研究，也包括他人所写的一些专题文章。那次研究工作一结束，我就很想把我从旧式的农村社会考查中得来的看法，再拿到现代社会中去检验一下。因为我感觉，象日本、中国、印度那样的庞杂社会，尽管会有很大进化，原来的社会结构却是绵延不断的。因而，为证实早期研究的这一理论基础，有必要对我的看法作进一步的探讨，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本书中所述及的日本社会的某些独特情况，对于日本和西方观察家们并不新奇，而且可能是在以往有关日本的著述中熟知的。不同之处是我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和综合方法。有关当代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大都把“传统的”和“现代的”因素当作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因素的代表，而着重于日本变化了的方面。这种研究方法，在美国占领期及此后的几年中，极为盛行。那时日、美社会科学家都习用这种观点。现在这种倾向也依然存在。按照他们的论点，凡日本所特有而西方国家却没有的特殊

现象，都可以贴上“封建的”或“现代化之前的”标签，并认为这些因素都是妨碍现代化的。这种观点后面，势必隐伏着某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日本社会全盘现代化之后，就（或应当）同西方社会一模一样。持这种论点的人，要么是想铲除封建因素，要么就想寻找类似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因素，并保存之。这样，日本社会这个统一体仿佛就被肢解成两块。但事实上，它仍然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依我看，所谓“传统”，正是这个社会机体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个因素），这个机体同时具有某些“现代的”特征。我所感兴趣的，正是社会自身的基本构成及其潜势——换言之，是社会的延续能力。

社会结构的这种延续性清楚地反映在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时尚中。环境变化时，集团组织是否随之变化，即取决于这种个人社会关系。这种延续性又反映在社会固有的基本价值准则里，并且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的坚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一体化的程度，和所经历的历史时期。在日本、印度、中国以及某些其他国家，繁荣的、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在近代史以前（相当于欧洲历史上封建时期以后），它促进了这些国家形成独特的社会思想体系。在近代史以前的历史进程中，渗透在确定形式中的社会准则是根深蒂固的，它或则促进，或则妨害现代化的进程。所以，研究这些社会准则对社会结构究竟有些什么影响，对于我就是个特别引人入胜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我因而联想到，日本恰恰为社会结构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园地。

这个问题，我是从结构分析入手的，而未从文化或是历史方面来铺叙。我称之为日本社会的纵式原则（vertical principle）的机制作用，就是本书的主题。在我看来，日本社会组织

最典型的特征，产生于社会关系中联系的单一性：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从来只有一种单一的明确关系。这种关系的作用适应整个日本社会的独特结构，同种姓社会或阶级社会根本不同。所以，日本的社会准则是很外露的。我的部分论点可能会让一些日本读者感到难以接受。在我触及日本人的某些弱点时，甚至会引起一些反感；然而我之所以要写这些，并非由于我对日本人或日本社会持有过于严苛的看法，而是因为我想尽可能如实地分析我所属的这个社会。我个人当然能理解整个机体有它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弱点不过是它的一小部分。

最后，我谨向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教授深表感谢，他作为编辑为此书的定稿贡献了详尽宝贵的意见，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也非常感谢杰弗里·鲍恩纳斯（Geoffrey Bownas）教授，他承担了为此书校订英文的繁重任务。他既能把我的文稿修订得如此流畅，而又毫不损及整个论述内容，真让我感佩之至。

# 目 录

中译本序	( 1 )
原 序	( 1 )
第一章 集团形成的准则	( 1 )
第一节 类属与组合	( 1 )
第二节 情谊联系与一对一关系	( 9 )
第二章 集团的内部结构	( 23 )
第一节 等级的发展	( 25 )
第二节 纵式组织的基本结构	( 39 )
第三节 集团领导人的资格和集团内人与人的相互关系	( 60 )
第四节 集团成员的一致作用	( 75 )
第三章 社会的综合结构	( 80 )
第四章 日本人的特性与价值准则	( 96 )
第一节 从上学到就业	( 96 )
第二节 同志关系网	( 110 )
第三节 狭隘性与实在性	( 120 )
结束语	( 130 )

# 第一章 集团形成的准则

## 第一节 类属与组合

下述分析中，使用了两个基本的、又是对偶的准则，即：类属与组合。这是两个新近形成的概念，在把日本社会同其他国家社会作对比研究时，这两个概念很有用，很富启发性。

首先让我们弄清这些术语的含义。下述分析中所说的集团，可以用两个准则来判别：一个是个人的共同类属准则，另一个是同一组合的范围准则。我使用的组合这个术语有着特殊意义，是同类属准则相对立的；类属这个词，也是用它具体的、广义的概念。组合可以指处所、机构，或把许多个人联结成一个集团的某种关系。不论哪种情况，它所指的都是某种准则，某个范围，和这个范围里所包含的个人所具有的共同基础。我的理论最初是从“组合”这个词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但在英文中却又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同义词。“组合”的意思是“处所”，但通常是用它来指一种特定场合，为一定目的形成的场合。“组合”这个词也用以称物理学中的英文词field（“场”，电场、磁场的“场”——译注）。

现在，我来说明这两个术语在各种实际情况下，如何应用。类属可以指，比如说，一个确定的亲族或种姓里的一员。对照来看，某村庄的所有老百姓，就是一种组合。一个人的类属可

以随出生而来，也可以由他的成就来获得。组合则多种多样。用这两个准则，你可以判别一个集团中各个具体的人，然后便能确定这个集团在整个社会中的分类，不管它有无集团实体的专门职能。地主，佃户，这样的分类所依据的就是类属，而地主连同他家的佃农作为一个单元看作一个集团则是基于他们所处的场合、范围。又如工业中，“车工”，“董事”，指的是类属，而“某公司成员”，则指的是组合。同样，“教授”，“职员”，“学生”，是类属，而“某大学的人”则是组合。

任何社会中，人们总是要依照一定的类属与组合，结成各种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可能有这种情况：有些集团的组成，这两个因素完全一样。但一般来说，它们只是部分重叠，有些成员同时属于不同的集团。这里主要来讨论这两个准则各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类属因素，或组合因素独自起作用的情况也有，还有些情况是，这两个因素互相竞争。一个社会如把这两个因素看得同等重要，在人民的社会意识中形成的社会准则里，就一定会产生密切的互利互惠关系。举例来看，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大致上是由他们的直接社会关系、组合来决定的；而在印度，却是由类属决定（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种姓制度，它基本上是一种按思想、职业和血亲建立的社会集团）。就这一点来说，日本和印度两国的社会，可能适呈最鲜明的对照，详细情况留待后面再讲。

日本人普遍注重隶属于哪个组合，而不大注重一般的类属。例如：当日本人向外界（向另一人）作自我介绍时，他总好先讲自己是哪个机构的，然后才会谈到他是干哪种职业的。他不说：“我是个排字工，”或：“我是个资料员，”而会说：“我是B出版社的，”或：“我属于S公司。”当然这也要看